

建筑文化论丛 王其亨 主编

中日古代建筑 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

张十庆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098

0

内容提要

东方建筑在世界建筑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方建筑研究既是为了进一步认识自身文化,也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东方和世界建筑文化。中日建筑比较研究是东方建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日本建筑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日建筑文化交流丰富多彩。本书以中日古代建筑比较研究为线索,侧重于中日古代建筑技术的源流与变迁的分析和探讨,涉及了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史的考察、法隆寺建筑技术的探讨、中日古代建筑尺度与空间的构成比较、《营造法式》模数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日本禅宗样建筑设计技术的分析等。本书可供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 / 张十庆著. —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5
(建筑文化论丛 / 王其亨主编)
ISBN 7-5618-1929-3

I.中… II.张… III.古建筑-建筑史:技术史-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TU-09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413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风和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网址 www.tjup.com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10.5
字数 240 千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数 1-3 000
定价 33.00 元

前 言

本书的主体基本上由六个专题研究组成，每个专题都是从“中日古代建筑的比较研究”这一角度，对中日古代建筑史上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探讨主要侧重于古代建筑大木技术及其源流变迁等问题，故以“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为题，汇集了这六个专题的研究，形成了本书六章的基本内容。第一章侧重于从整体的角度，对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史的考察，为其后五章技术内容的探讨作了总的背景性考察；第二章以中日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法隆寺建筑的大木技术为探讨对象；第三、四章就中日古代建筑技术上的尺度构成与空间构成这两个专题，从特定的角度试作了一些探讨；第五章从中日比较的角度，探讨了对古代中日建筑技术及其研究均具重要意义的《营造法式》的若干方面；第六章分析了源于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的日本中世禅宗样建筑技术的性质及其特点，以此探寻这一时期中日建筑技术的演变过程及其源流关系。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历史上中日建筑之间的特殊关系，注定了中日建筑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立场而言，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中国建筑体系的整体、全面的认识，也具重要的意义。其不但有助于认识中国建筑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借助于对域外中国系建筑的研究，反过来，对中国本土建筑的进一步认识和解明也大有益处。因此，中日建筑的比较研究当属中国建筑史研究上的重要一环。本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日建筑史上某些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建筑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建筑史上的“古代”概念，在日本建筑史上又再细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本书在论及日本建筑时，采用了日本的分期概念，而在某些泛指场合，仍采用中国建筑史的“古代”概念。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日古代建筑文化的交流 (1)
	第一节 古代东亚建筑体系的形成及性质 (2)
	第二节 佛教建筑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 (3)
	第三节 唐代建筑的影响与日本古代建筑体系的确立 (11)
	第四节 宋元禅宗建筑对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16)
	第五节 黄檗文化与日本近世建筑 (26)
第二章	法隆寺建筑的大木技术 (36)
	第一节 法隆寺建筑的大木结构 (39)
	第二节 法隆寺建筑的尺度构成 (51)
	第三节 法隆寺建筑大木技术的性质及其意义 (59)
第三章	中日古代建筑的尺度构成 (64)
	第一节 尺度与尺度的传播 (64)
	第二节 奈良时代建筑的尺度构成 (67)
	第三节 唐宋辽时期建筑的尺度构成 (78)
第四章	中日古代建筑的空间构成 (95)
	第一节 地盘构成与空间构成 (95)
	第二节 日本建筑构成表记法及其空间构成 (96)
	第三节 唐宋建筑构成表记法及其空间构成 (99)
	第四节 传统空间构成规制的解体 (102)
	第五节 大明宫麟德殿“三面”说试析 (104)
第五章	《营造法式》变造用材制度 (108)
	第一节 《营造法式》的性质及其比较 (108)
	第二节 八等材分模数制的构成 (111)
	第三节 变造用材的大木作制度 (116)
第六章	日本禅宗样建筑的设计技术 (127)
	第一节 古代技术体系的继承与演变 (128)
	第二节 禅宗样建筑的尺度构成(一) (132)
	第三节 禅宗样建筑的尺度构成(二) (140)

0A1169/3

后 记	(152)
参考文献	(153)
插图目录	(156)

第一章 中日古代建筑文化的交流

中日建筑文化的交流，当从属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之下。众所周知，历史上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和密切的交流关系，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尤其是日本古代文化，得到了外来中国文化的塑造和推动，这使得日本文化的发展及其性质，带上了特殊的烙印。关于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的过程及性质，中日两国学者多有研究，这使得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及性质，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成为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指导背景和基础。

日本著名中国科学史学家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日本》一书中，就中日文化关系的性质指出：“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学习了文字，接受了佛教与儒教，在历史、数学、医学等学科的诸领域中，日本人学习了中国。进而，在衣、食、住的几乎所有技术方面，也都受教于中国。随时代不同，虽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直至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受中国文明极大的影响，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1]。在文化性质上，日本直至明治维新（1868年），是作为中国文明圈的一员而存在的。

关于中日文化的性质及其对比，薮内清又指出：“日本成为中国文化圈中最为优秀的国家。中国的文明几乎均是依自力而筑成的，与此相对比的是，日本的文明与其说是创造，还不如说是选择了模仿的道路”^[2]。中国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日本文化，都是接受大陆文化以后的文化。严格地说，跟朝鲜、安南（越南的古称）一样，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3]，以上皆极言中日文化渊源的一致。

作为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日建筑文化的关系及性质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日本建筑史学界是这样概括和认识日本古代建筑的体系及性质的：“虽然在佛教传来以前，大陆建筑的影响已被确认，但给建筑界带来巨大变革的是最先通过朝鲜半岛，尔后直接从唐传来的中国建筑样式。基于此，日本建筑的样式，直至明治维新，一直是作为中国建筑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发展的。”^[4]这是日本传统建筑性质的一个重要特色。

还应看到的是，日本建筑是在与中国不尽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尽管日本建筑文化的主流源于中国建筑体系，也尽管日本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不断地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民族的特色。不同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造就了日本建筑独特的气质与风格。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失。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从高处向低处，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摄取与同化正表明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及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对先进文化的执著追求。这正如同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吸收和消化了印度佛教文化一

样,日本也同样吸收、消化了中国文化。日本建筑的发展史正如伊东忠太所评价的那样,“是外来建筑的摄取与同化的历史”^[5]。

在接受大陆文明之后,文明起步远晚于中国的日本,其建筑的发展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国用漫长岁月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并走在中国的前面,跨入了现代建筑的行列。吸收欧洲近代文明的日本人,也正是曾经吸收唐宋文化的日本人,其中不无值得深思的东西。文化的比较使人从中获得历史的经验,从日本文化发展上可以看到:善于吸收异民族文化的能力,恰恰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的活力。

文化是世界性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他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愿作为世界公民的现代中国,从日本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学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第一节 古代东亚建筑体系的形成及性质

世界文化若大分之,可分为东西两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东方的概念姑且限于亚洲大陆)则由三大系统构成,即西亚的巴比伦文化、南亚的印度文化和东亚的中国文化。此三大文化体系,各以其发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波及、扩展,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影响圈。以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为发源地的中国文化体系,向东扩展的结果,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东亚中国文化圈。其组成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日本、渤海及琉球等国,其特点是皆以中国文化为基调,在文化的诸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共通性,在文化的发展及演化上,带有系统的整体性及连动性特征。

东亚中国文化圈在形成之初,即表现出以佛教为主体、以中国为中心的佛教国家群的特征。其中尤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者的关系最为稳定,且最具代表性。相应地中、日、朝三国间的建筑关系也最为密切。我们不可能把建筑的发展与其文化背景割裂开来,东亚中国建筑文化圈在文化大背景下的形成与发展正表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东亚建筑文化圈的形成,是以佛教建筑为基础和纽带的。因而,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是东亚建筑文化圈形成的标志。正如中国的佛教来自于西域,东亚的佛教则源于中国。具体地说,来自于西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中国佛教,然后传播至东亚诸国。先是进入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相应地,中国佛教建筑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文化所构成的,建筑文化的精华,也基本上是反映于宗教建筑之上。佛教建筑构成了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骨干,历代佛教建筑之传播和影响也构成了东亚建筑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作为东亚建筑文化圈上的一环,日本及朝鲜建筑表现有如下共同的体系特征^[6]:

- (1) 采取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主要形式,即梁、柱、斗拱的结构体系;
- (2) 在唐建筑文化的影响下,采用律令制度下的建筑生产和组织形式;

- (3) 建筑生产工具的一致;
- (4) 建筑之精华所在的宗教建筑、都城及宫殿,采取中国传统的形式与布局;
- (5) 建筑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在本质上同理同趣,表现出深刻的关联和相通;
- (6) 建筑的发展与演变表现出与中国建筑密切相关性及连动性。

作为一种共享的建筑技术体系,必有其内在的规制和约定。其技术属性无论受任何外在影响,都不会轻易地消失,而且理应有形而下的表现。这些形而下的表现又都将成为反映共同技术体系内在规制和约定的特征。中、日、朝建筑所共有的侧脚、生起、推山和反宇等技术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表现及其共同的技术基础。

中日建筑文化的交往,姑且以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建筑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作为其始,那么,至日本文化全面倒向西方的明治维新止,中日两国建筑文化的交往,至少也持续了1500年以上。这使得日本建筑文化的构成带上了相应的特点,与中国的密切交往,是日本传统建筑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色。

第二节 佛教建筑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

早在远古,日本列岛便漂离了大陆,成为孤岛,朝鲜则呈半岛状与大陆相接。是中国佛教的传播与普及,使得日本孤岛在文化上与大陆联成一体。民俗学与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佛教史前,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着相当的接触和交往。在初期,大陆对海东孤岛的认识,仅朦胧于想像中的海上仙山。传说秦始皇时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畏诛不敢还而止于此洲,生息相传^[7]。东汉时对日本已颇有了解,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两千年前中国人眼中的海东日本^[8]。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变革,发生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期间,史称“弥生时代”。变革来自于大陆的以水稻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冲击。据考,这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向四方传播的结果。传播的路线有多说,其中最为有力的是从长江入海口到山东省南部一带的海岸,然后再直接跨海到日本^[9]。民俗学上的大量事实也揭示了弥生文化源于南中国长江流域下游。这一文化在建筑上表现为干栏建筑的形式(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日本民族学学者鸟越宪三郎从史学的立场提出了倭族论^[10],建筑学者若林弘子则从建筑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11],提出日本建筑史上所出现的干栏建筑是基于水稻农耕生产形态之上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建筑形态,倭族的初民在中国云南省滇池湖畔成功地进行了稻作的人工栽培,并在水稻农耕及干栏式建筑的伴随下,向四方移动、迁徙。沿扬子江而下往东迁徙的一群中,又有一部分成为渡至日本列岛之倭人。也就是通过这些倭人,将水稻文化和干栏式建筑传入了日本。稻作民族与干栏建筑具有不可分的关联。日本出土的家屋文镜及铜铎上,表现有这一类稻作文化圈共通的建筑形式,并与云南地区古代建筑形象以及现今该地区少数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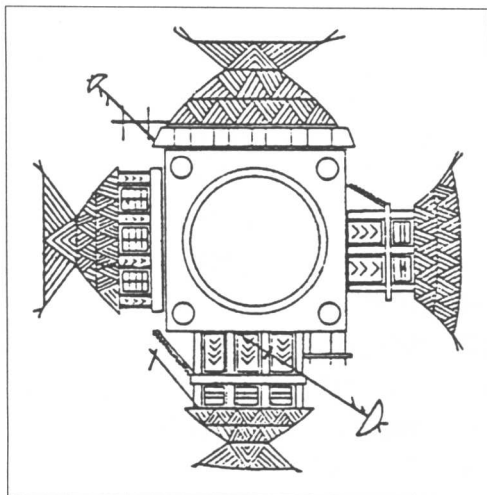


图1-1 日本家屋文镜上的干阑建筑形象（约4世纪）

建筑的形式一致（图1-1）。

历史上自遣唐使以来，日本积极汲取北中国的中原文化，但那仅是作为一种上层文化的表现，在此之前以及作为庶民真正的生活基础，则源于南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文化。近年来，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将世界文明分为两大源流，即所谓的照叶林文化与硬叶林文化^[12]。照叶林文化又被称为水稻的文明，是东亚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文明的母体。其中心源地被设定为“东亚半月弧”地域（图1-2），正为中国的云南省处。日本的干阑式建筑，在2000多年前，随着水稻农耕技术，沿着照叶林文化地带，越山渡海传至日本的可能性为学者们所指出。



图1-2 世界文明的两大源流——照叶林文化与硬叶林文化

事实上，这一时期南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伴随着水稻农耕文明而传入日本的干阑建筑形式，赋予日本建筑以决定性的性格，即所谓高床式建筑的出现，并成为日本建筑造型的原型之一（图1-3、图1-4）。日本神社建筑应源于与稻作农耕相伴随的干阑式建筑（图1-5）。日本在接受水稻农耕文明之后，便成为东亚建筑文化圈的一员。

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白马寺为始的佛教建筑随之在中国出现。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至极盛，并以中国佛教的形式向外辐射。中国佛教犹如一根文化纽带，将东亚诸国联成一体。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带来的佛教建筑的普及，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建

筑文化圈的形成。

在东亚，中国佛教建筑先是传入朝鲜半岛，并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这在东亚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以此为契机，中国建筑体系移入朝鲜和日本，由此朝鲜和日本的建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汲取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不但自己汲取了中国的建筑文化，而且还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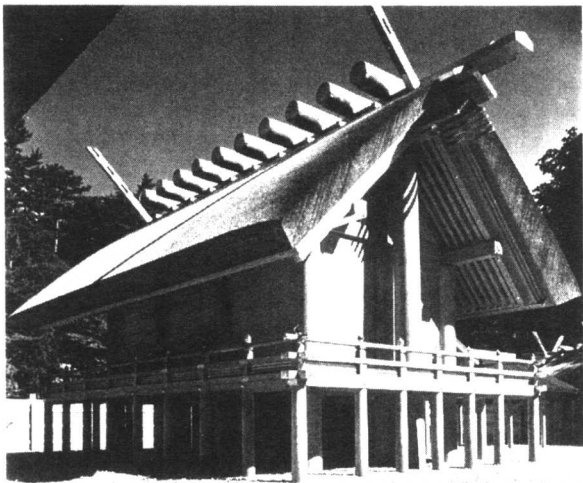


图1-3 日本干阑式建筑（伊势神宫内宫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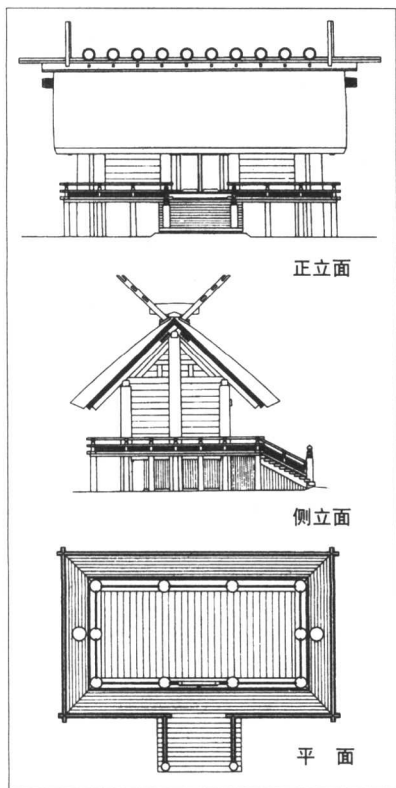


图1-4 伊势神宫内宫正殿平面、立面、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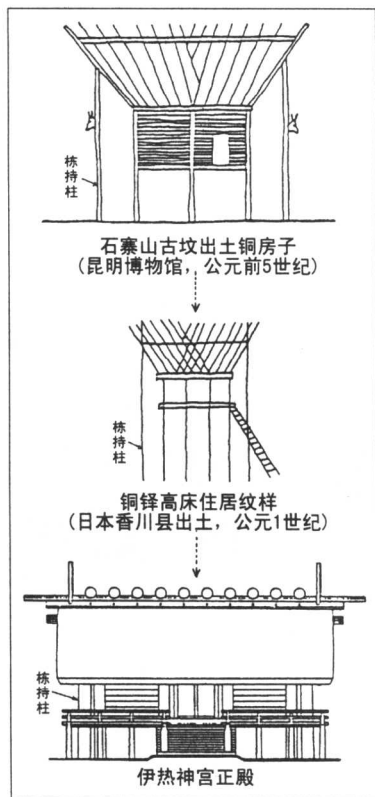


图1-5 干阑式建筑的源流——云南建筑与日本干阑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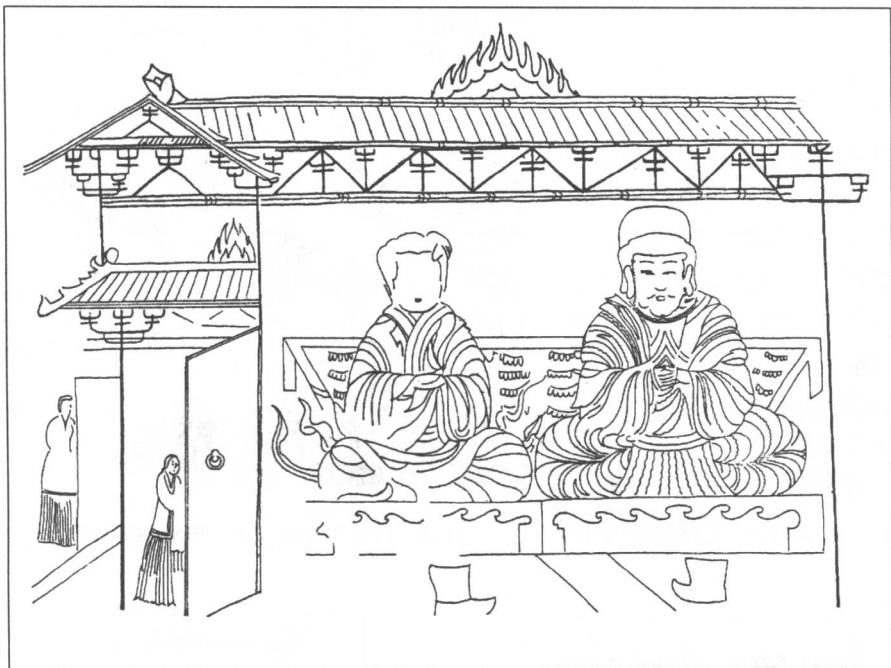


图1-6 高句丽古坟壁画中的建筑形象——双楹冢殿堂图

建筑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充当了传播的桥梁和老师。

乐浪是早期中国文化向外辐射的据点。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于朝鲜半岛设乐浪等四郡，汉文化予朝鲜半岛以重大影响，史称乐浪文化，汉代文化和技术席卷周边各地。公元313年，高句丽灭乐浪郡，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代，中国相应地为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日本则为古坟时代中期。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及百济与中国交往密切。高句丽至公元668年为唐高宗所灭为止，一直保持着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至中国东北部的强国地位。关于其建筑在《三国志·魏书》及《旧唐书》中有所描述^[13]，佛寺和宫殿兴盛。从交流关系上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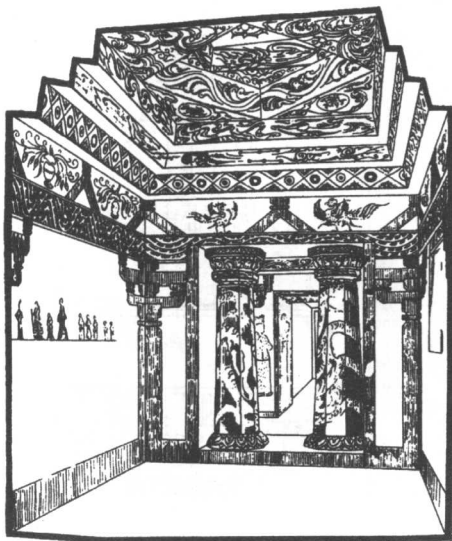


图1-7 韩国平南龙冈郡高句丽双楹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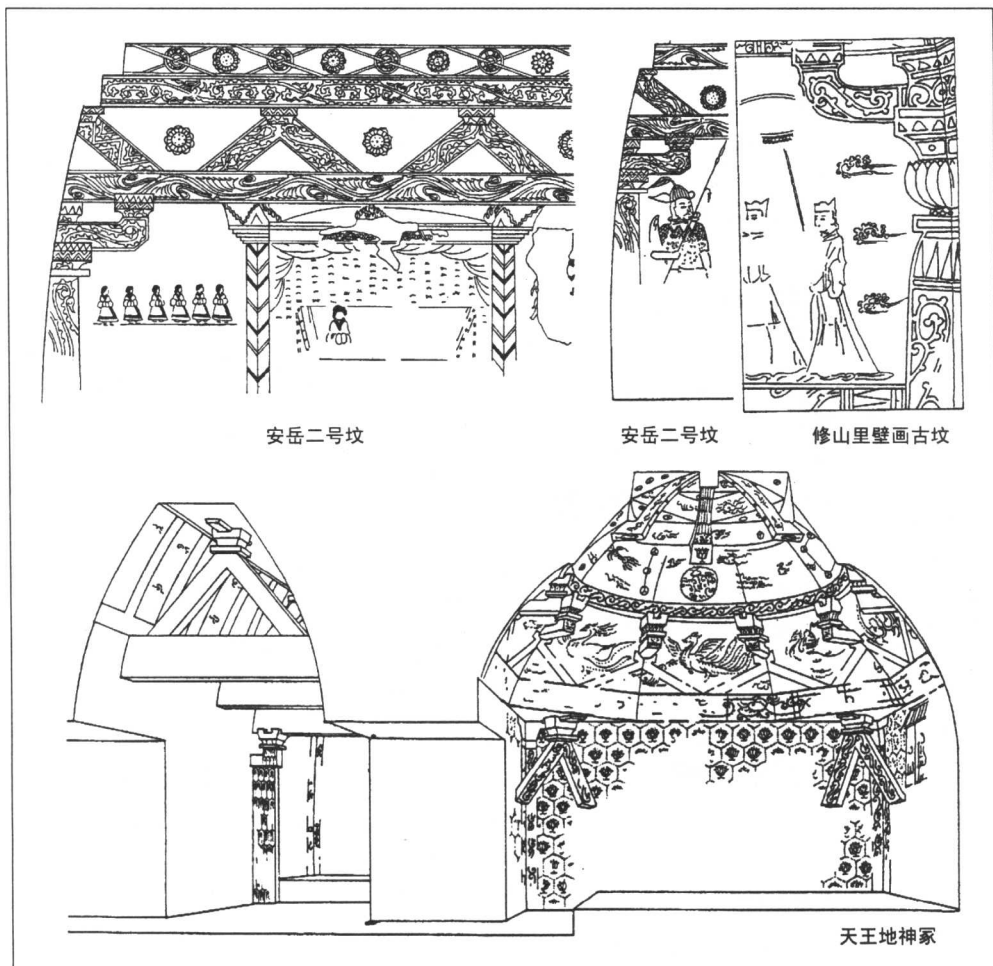


图1-8 高句丽古坟壁画中的建筑形象

高句丽似主要摄取的是中国北部的建筑样式，其实构虽不存，但高句丽古坟壁画中保留有当时的建筑形象，是早期中国系建筑的珍贵史料，并与早期中国北系建筑形成很好的参照（图1-6～图1-8）。

与高句丽相对照的是，朝鲜半岛三国中的百济，除遣使往中国北朝以外，自公元372年向东晋朝贡以后，与南朝的交往亦频繁。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于公元384年，从东晋输入佛教，佛教建筑也随之于翌年出现。南朝在建筑上当予百济以重大影响。百济时代的木构虽不存，但考古及文献记载表明，百济文化与南朝文化关系密切，建筑当也不例外。百济公州宋山里六号坟砖铭文“梁官瓦为师矣”，即示其一端。中国正史《梁书·百济传》记有：“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百济佛寺随之隆盛了起来。百济时代所遗存建筑有“大唐平百济塔”（石构，660年）



图1-9 百济扶余定林寺址五重石塔
(大唐平百济塔·660年)

等(图1-9)。

朝鲜半岛三国中,新罗的佛教传入较迟,且间接传自高句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新罗同时与南朝和北朝交往。文献记载表明,6世纪中叶以后,其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于南朝,佛寺造营兴盛。其中以皇龙寺(553年创建)规模最大,建筑技术也已达相当的水平。根据《三国遗事》记载,645年兴建的皇龙寺九重塔,“铁盘以上高四十二尺,以下一百八十三尺”。

要之,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的三国,在文化上与中国南北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有偏重地摄取南朝与北朝的建筑文化。严格地说,都是一种中国南北朝文化的移植,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复合、交杂的状态。但由于地理、文化及外交上的因素,高句丽或更偏重于对北朝建筑文化的摄取,而百济则受南朝的影响似乎更大。百济与南朝,特别是与南朝的梁的文化关系,还对日本飞鸟时代的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南北朝佛教建筑向日本传播的中介,百济与高句丽对日本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与南朝交往密切的百济。公元552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日本以此为标志,从古坟时代进入飞鸟时代。百济不仅将佛教传入了日本,并且还向日本送去了建造寺院的工匠。据《日本书纪》记载:敏达朝时(577年),百济向日本贡纳造佛工及造寺工各一人;崇峻朝时(588年),送造寺工二人,炉盘工一人,瓦工四人及画工一人。于是,当时日本的大豪族苏我氏,立即使用来自百济的工匠,从588年开始营建日本最初的佛寺法兴寺(又称飞鸟寺)。以飞鸟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的出现,使得日本建筑在体系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关于日本飞鸟时代的建筑样式,无实物得以参照,关于其体系所属,日本伊东忠太主张属中国北朝系,传播途径为:北朝→高句丽→日本飞鸟。自20世纪40年代起,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南朝系说,渐成为有力之说。即传播关系为:南朝→百济→日本飞鸟。

日本飞鸟时代建筑的成分当甚复杂。首先作为文化之源的中国,南北二朝分立;作为传播中介的朝鲜半岛,也呈三国鼎立状态。时间与地域因素的交叉,传播与交流过程的复杂,都必影响飞鸟时代建筑的性质及样式。根据文化交流的关系,基本上可

以推定飞鸟样式与朝鲜半岛的百济、并通过百济与中国的南朝关系密切。4世纪初至5世纪后期，中国北方始终处于战乱之中，而以江南建康为都的南朝，则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并被认为是汉文化的正统所在。或许当时的外族会对南朝文化更加偏爱一些。

现存世界上最古之木构建筑为日本奈良法隆寺建筑。关于法隆寺建筑样式的性质及源流，多有争论。据《日本书纪》记载，法隆寺建筑于天智九年（670年）烧失^[14]。因此，现存法隆寺建筑当为其后再建之构，年代上约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奈良时代前期^[15]，但在样式及技术上却与大体上同期的、反映初唐建筑样式的白凤样式（奈良药师寺东塔）甚异。从样式及技术成分上分析，现存法隆寺建筑显然反映的是较其再建年代为早的建筑样式与技术。可以认为法隆寺建筑保持了初唐建筑样式直接传入日本之前、来自于朝鲜半岛三国的建筑形式。从当时中国、朝鲜及日本之间的建筑交流关系来看，当为朝鲜半岛上所汲取、积淀和交杂的中国南北朝、隋（某些成分甚至有可能更早）的建筑形式的再现。这一建筑样式，日本称作飞鸟样式。其代表建筑主要有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及回廊，以及法起寺三重塔等（图1-10、图1-11）。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的伽蓝布局形式，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轴线对称的前塔后殿布局形式（如四天王寺）以外，还出现有如飞鸟寺那样的一塔三殿的布局形式（图1-12）。至7世纪中期，更出现了塔、殿左右并置的非对称布局形式，成为双塔式布局的先声，法隆寺伽蓝即为典型的非对称布局形式^[16]（图1-13）。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均以中国文化为祖型，或者不如说存在着中国为祖父、朝鲜半岛为父、日本列岛为子这样的传承关系。”^[17]

1972年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发现，再次确认了日本古代文化与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之深刻的关联性，表明了日本古代文化是作为东亚文化的一环而成立的这一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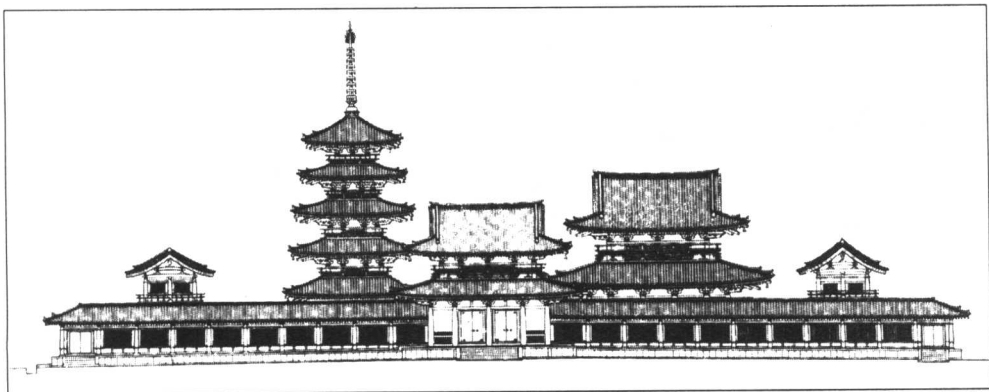


图1-10 奈良法隆寺西院伽蓝南立面



图1-11 奈良法隆寺中门（7世纪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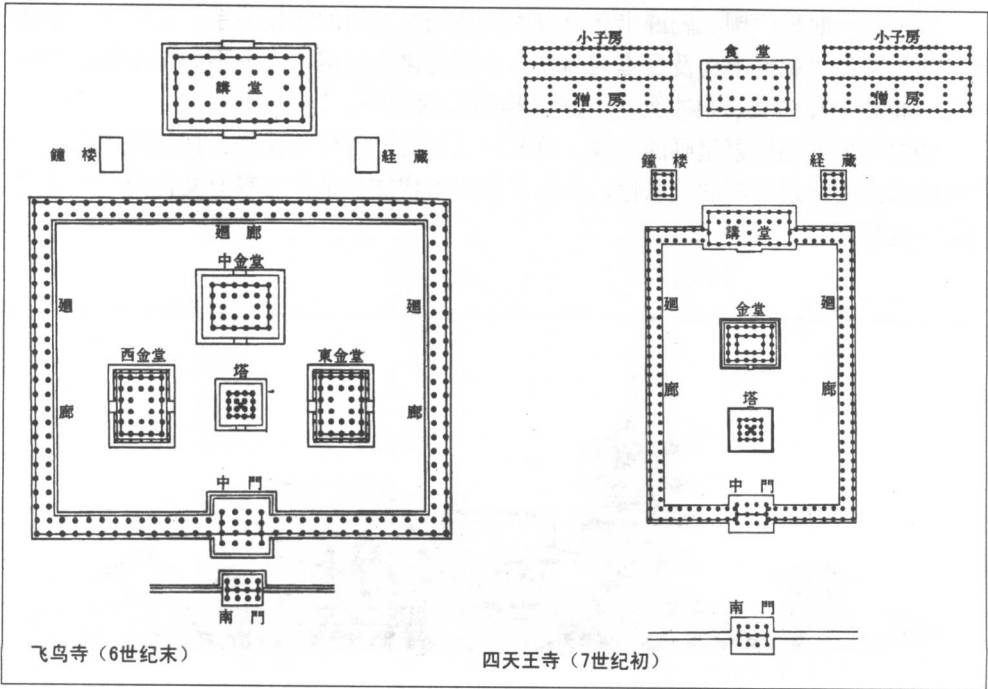


图1-12 日本飞鸟时代伽蓝布局形式——前塔后殿对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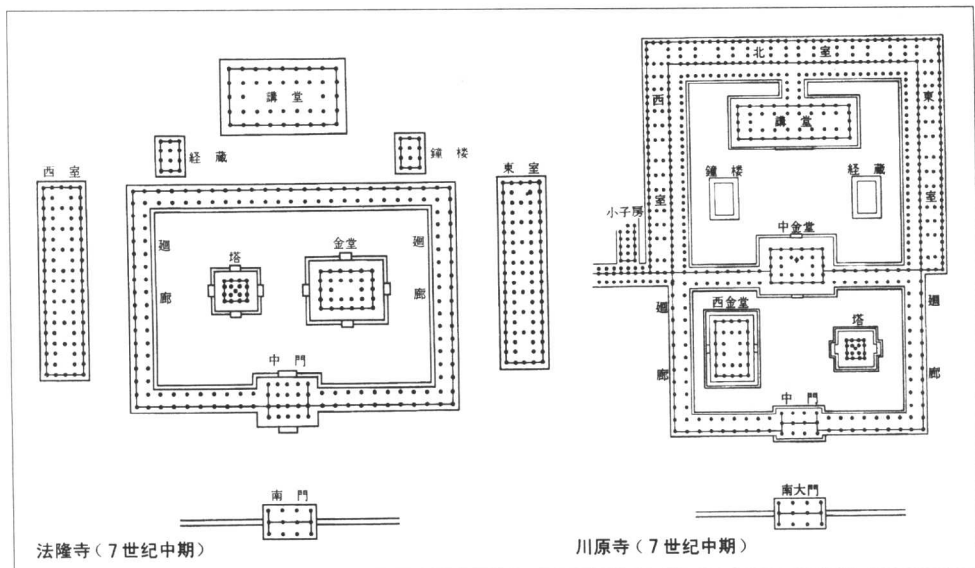


图1-13 日本飞鸟时代伽蓝布局——塔殿并列非对称式

第三节 唐代建筑的影响与日本古代建筑体系的确立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统一了分裂近三百年之久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重又回到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庞大唐文化体系，于7世纪至10世纪间，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性文化。唐文化对外影响最大的地域为东亚，在东亚范围形成了以唐为中心的唐文化影响圈，唐与周边诸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万国衣冠朝长安”的君臣、联盟的关系。

在朝鲜半岛，新罗联唐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由三国鼎立走向新罗一统，朝鲜半岛由此进入统一新罗时代（670年—935年），并在大量吸收唐文化的基础上，达朝鲜艺术的鼎盛时期。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出遣隋使，开始了对隋、唐文化的直接输入。随着大化改新（645年）及不断的遣唐使的派遣，7世纪中期以后，唐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显著地表现了出来，时值日本奈良时代的前期。对世界性的唐文化的导入，使得日本走向国际化，一举与世界连在了一起。在文化传播上，以长安为中心的丝绸之路西达地中海，东则延至奈良平城京。日本在全面吸收唐文化之后，作为东亚强国登场。“世界第一的唐文化传入日本，是日本文化异常发达的原因。”^[18]

都城是演出律令制度的中央舞台。随着唐律令制度的传播，都城文化在东亚诸国展开。日本以藤原京（694年—710年）和平城京（710年—784年）为中心，展开了白凤文化与天平文化，是为奈良时代的前、后期，并于天平时代达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

时代。朝鲜半岛也以新罗庆州为中心，形成灿烂的新罗文化，繁盛达两个半世纪。中国都城的构成理念，在日本的藤原京上初次确立，并于平城京与平安京得以发展和完善。盛唐时代、奈良时代与新罗时代，是东亚三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可并称东亚文化艺术的盛世。八世纪的东亚三国，各以其都城为中心，创造了东亚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随着律令制度在日本的确立，律令建筑生产组织方式也随之进入日本，建筑生产趋向高度的组织化和技术化。以唐将作监为基础的日本木工寮，即是其律令建筑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大化改新（645年）之初，日本模仿唐制所设置的八省百官制度中的建筑营缮官司，采取的是唐将作监的形式^[19]；大约在8世纪左右，改为木工寮的形式^[20]。在营缮制度上，日本多仿唐制，相应典章制度内容及形式上的相近乃至一致即示其一端^[21]。

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文化的摄取以模仿为特色，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到当时贵族们的喜爱。“本朝制度，多拟唐家”^[22]，正反映的是这一特色。当时的遣唐使在唐文化的输入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中右记》永长元年（1096年）十月十一日条有如下记载：平安宫“太极殿者大唐大明宫含元殿之体也，遣唐使常副申也，一事不违彼宫，是依有兴事所记付也”。所谓“遣唐使常副申也”，表示无图，而是依遣唐使之报告。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及复原与平安宫太极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宫殿制度上日本对唐文化的受容程度。

从奈良时代开始，日本寺院的造营隆盛了起来，佛教建筑成为其建筑的主流。这一时期日本留学僧将在中国兴起的佛教学说，逐一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所谓的“南

都六宗”。唐代寺院形制及建筑技术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如唐长安名寺西明寺，即与日本入唐留学僧关系密切。据文献记载，入唐僧道慈律师，曾“偷图取西明寺结构之体”，回国后仿长安西明寺，主持建造了平城京大安寺^[23]。

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文化的热情及吸收能力是惊人的。在不长的时期内，其建筑样式迅速地从飞鸟样式过渡到奈良时代前期的以初唐样式为基础的白凤样式（如药师寺东塔）（图1-14），然后又向中国的盛唐样式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天平样式（如唐招提寺金堂）



图1-14 奈良药师寺东塔（730年）